《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

李国荣

大型清代档案史料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以下简称《雍正朱批》)，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部分同志历经6年编纂，现在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全部影印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大的明清档案史料书籍。本文拟对该书所辑档案的概况、史料价值和编辑出版方面的得与失略作评介。

一

《雍正朱批》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档案文献汇编。全书共分40册，约2800万字，精装影印。该书系编年体例，按具折时间之先后统一编定顺序，共辑入现存于世的雍正元年(1723)到雍正十三年内外文武大臣1200余人的汉文奏折约33000余件。其卷册之浩繁，数量之庞大，是前此明清档案史料出版公布史上所未有的。

《雍正朱批》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8册)之后，向史学界推出的又一套系统的朱批奏折史料。奏折，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是史料价值很高、数量较多的重要档案之一。这种官文书大约始行于康熙20年代，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一种君臣之间秘密通讯联系的新型文书。康熙后期，奏折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到雍正时，奏折就被推广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机密官文书，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缴回朱批奏折、抄录副本等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奏折成为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重要的上行官文书。这样，自康熙晚期直至清末的200余年间，凡属国家机要政务，无论在京部院大臣，还是地方督、抚、藩、臬以及提、镇大员等，均须先用奏折向皇帝奏报。皇帝的旨意，即用朱笔亲批其上，发还具折人遵照执行，是为“朱批奏折”；也有一小部分奏折，皇帝未予批示，且留存在宫中，谓之“原折”。可以说，奏折是清康熙以后历朝皇帝直接处理庶务、察核官吏、洞悉下情、推行政令的重要工具。因此，举凡康熙朝以后清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和外交等机要事务，奏折内均有记载。其内容之丰富、具体和可靠，是其它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它们不仅是许多历史文献所载内容的最初来源之一，而且许多内容，还是其它文献资料所未载，或载而不详、载而不确者。正因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朱批奏折倍受史学界重视，是利用率相当高的档案全宗之一。

现今存世的满汉文朱批奏折，是由于雍正帝规定了缴回朱批奏折的制度之后，才得以集中和保存下来的。其总数约达72.3万余件，原来统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

物院文献馆集中保管，40年代末被国民党政府运去台湾15.84万余件。雍正朝的汉文奏折（包括“朱批奏折”和“原折”）目前存世的大约有33000余件，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5000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8000余件。这种一朝档案分存两处的状况，给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查阅和利用档案造成了极大的不便。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将所藏雍正朝满汉文奏折汇编成《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以下简称《宫中档》）一书，相继影印出版。这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雍正朱批》，一部分选自馆藏雍正朝汉文奏折原件，另一部分即转录自《宫中档》一书中的汉文奏折。这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把分藏于北京和台北两地的雍正朝汉文奏折汇集一起，按编年体例统一编排，影印出版，从而提供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原始档案文献，实为史学界、档案学界一大幸事。

二

《雍正朱批》是研究雍正朝乃至康乾盛世历史的珍贵史料。雍正一朝13年，上承康熙，下启乾隆，在清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康熙、乾隆两朝，史称康乾盛世，然康熙后期，皇帝倦勤，官吏玩愒，库帑亏绌，国力渐衰，社会矛盾亦趋尖锐。雍正改元，整顿吏治，力除时弊，并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改土归流、除豁贱籍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吏治的相对澄清，社会的相对安定，国库的充裕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为乾隆初期的持续发展和康乾盛世的维持奠定了基础，兼有巩固和开创之功。雍正帝的这些政策措施是如何与群臣商定、怎样推行实施、其收效又各有多大，这些问题在《雍正朱批》中，均有翔实的记载。另外，从雍正初年有关臣工的奏折和朱批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帝分化瓦解允禩、允禟集团和处理年羹尧、隆科多两大要案的历史痕迹；从允祥、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和李卫等人的奏折与朱批中，我们可以透视出雍正帝用人论才技而不限成例的方针以及他与这些宠臣无所不谈的亲密关系；从书中有关奏折和朱批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雍正帝非同一般的才能学识、刚毅而急躁的性格和讲求祥瑞、崇佛用佛的思想，等等。总之，《雍正朱批》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研究雍正帝本人、研究雍正时代的臣工等诸多问题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雍正朱批》是研究清代文书档案制度特别是奏折制度的第一手史料。雍正帝即位后，为进一步强化君权，将能够直达御前的奏折推广使用，确立了有关奏折制度。从《雍正朱批》辑入的奏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其一，具折人的范围大为扩大。终康熙一朝，能够具折的满汉官员总计不过200余人。到雍正时，不仅中央各部院衙门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官员，地方督、抚、布、按、提、镇以及钦差官员如学政、织造、盐政、监督、各种巡察御史等皆令具折奏事，而且还特许了一些道、府、州、县及副将、部院司官等中下级官员径上奏折。据现存雍正朝汉文奏折统计，在雍正13年中，实际具折官员已达1200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二，奏事的范围大为扩大。康熙时，奏折具有君臣间秘密通信性质，奏事范围还不甚广泛。在《雍正朱批》中，雍正帝反复批示谕令内外臣工，无论本职本地，抑是都门内外，邻省远省，一切地方之利弊，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旸果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以至廷臣臧否，皇帝之一切举措或得或失，总之“凡天下有关吏治、民生、兴除、劝惩各事”，不必真知灼见，也无须待访的确，但有心得听闻，都要密奏毋隐。其三，进一步加强保密措施。在《雍

正朱批》辑入的许多奏折上，雍正帝再三批复告诫内外官员，奏折既非露章，惟以慎密为要，“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规定具折人不得私自存稿和外泄所奏内容，不得将朱批内容传告他人或写入本章，违者即停止其具折权乃至予以严惩。并且，由内廷特制配备西洋锁匙的折匣，颁给每个具折人2至8个不等，专供封装递送奏折之用，其折匣钥匙由皇帝和具折人分别执掌，他人无权也不能开启。其四，缴回朱批奏折制度得到切实执行。雍正帝即位之当月，便严谕内外官员将乃父康熙帝的朱批奏折和朱谕俱行收集封固呈缴。同时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亦著缴进，不得抄写存留。”此后，又以呈缴日期迟早不一，再次通饬文武官员，接到朱批奏折后即于下次具折时乘便缴回宫中，不得任意迟延，并进一步规定：凡因事降调或病故之员，其未缴朱批奏折及锁匙折匣，即由本人或家属呈明本省督抚、本旗都统代缴，不得隐匿存留，违者治罪。《雍正朱批》中大量的“恭缴朱批”的奏折，充分表明缴回朱批奏折的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在雍正元年正月奉到上缴康熙朱批奏折的谕旨，他“逐一检查”“一切清汉奏折”,把所存107件已奉御批和26件未奉谕批康熙年间的奏折汇集起来，一次缴回。甘肃提督宋可进被参革职，立即将手头的朱批奏折26件、请安折22件、折匣4个、钥匙2把，经新署甘肃提督刘世明之手，转给署陕西总督刘于义，刘于义如实上缴，并具呈专折说明这一情况。除上述几点外，由于《雍正朱批》载录的奏折系属影印出版，基本保持了奏折文体程式的原貌，如实地再现了雍正帝及一代名臣的亲笔墨迹，这对研究清代奏折特有的公文格式，也是颇有助益的。

《雍正朱批》对研究《朱批谕旨》的修订情况提供了系统的原始材料。雍正十年，雍正帝命臣僚将他即位以后亲笔批阅过的223名高级官员的奏折进行选编,最后选出8000余件朱批奏折，经过对官员原折和雍正帝的朱批进行认真的修订，汇集成《朱批谕旨》刊刻，分别颁给内外文武大员，“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训以正德厚生之要。”在这次编纂《朱批谕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誊清修订折”，即入选朱批奏折的修订稿。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这些“修订折”现在基本上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业已辑入，其所依据的朱批奏折原件，则多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基于此，对那些已无原折的“修订折”，《雍正朱批》将其视作正常折件按具奏时间依次收录，对大量的原件仍存的“修订折”，《雍正朱批》则把“修订折”作为原件的“附录”，编排在一起，一并辑入。我们把《雍正朱批》辑录的有关朱批原件与其“修订折”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修订折”的折文和批语多有修饰增删，有的甚至与原折差异很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雍正帝阅览奏折时信手批写的比较口语化的批示，在“修订折”中基本上都进行了文笔加工，酌改后的朱批指示比较文雅讲究些。如《雍正朱批》第4册收录的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广东巡抚年希尧的一件奏折，其原件所奉朱批是：“总是叫几个蛮幕宾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若是你兄弟敢如此诳上，你如此隐忍得么？你若挟私，具折请罪。若年羹尧欺朕，粉饰此事，你亦当具本”。其“修订折”的朱批则为：“无非令几个幕宾敷衍一篇套文，何尝有一句切实之语！……设或伊敢如此诳奏，尔竟嘿嘿隐忍，不置一辞可乎？尔其审之，如尔挟私是实，则当具折请罪。如系尔弟诳辞粉饰，尔亦当具疏辩析。”还有一些“修订折”，将原折的内容大大删减，甚至从“修订折”中已看不出原折奏陈的具体事宜。《雍正朱批》第7册有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川陕总督岳钟琪一折，奏陈宁夏地方事宜八条，长达3700多字，而该折的“修订折”仅有1200余字，所奏陈的八条事宜均被删掉，只留有原折的开头部分。诸如此类，“修订折”与原折差异颇多。经核对考证，《雍正朱批》把有关原折与其“修订折”收集编排在一起，这对了

解和研究《朱批谕旨》的编修情况是很有帮助的。另外，《雍正朱批》所辑奏折是《朱批谕旨》的选材基础，两者对比，亦可看出《朱批谕旨》的选材标准和编纂原则。

《雍正朱批》辑入的雍正朝履历引见折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履历引见折是内外文武官员按例被引见过程中形成的，一般由引见折、官员履历和皇帝的批语圈点几部分组成。引见折由吏部主稿，官员履历由各官亲自书写。它具体地记录了被引见官员的履历、官职任免情况和皇帝的朱批评语，在当时是一种机密的人事档案，是研究雍正帝用人行政和这些历史人物新鲜、生动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雍正朱批》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7000余件雍正朝履历引见折，按被引见官员的姓氏笔划编排，分7册辑录于卷末。这是该书史料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

三

《雍正朱批》的编辑加工总的来看比较精细讲究，对《宫中档》在编纂方面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做了相应的纠正，从而使北京和台北两地分藏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较好地合编在一起，为读者研究利用提供了便利。这点，除了上面谈到的比较妥当地处理了朱批原折与“修订折”的关系外，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雍正朱批》中奏折的编排次序较之《宫中档》讲究些

《宫中档》辑入的奏折，多是按具折时间随便排列，至于同一官员同一天的多件奏折，哪件该在前，哪件宜在后，却未予研究考虑。《雍正朱批》则注意了这一点，一是同人同日的几件奏折，根据其内在关系编排。雍正九年八月十九日，兰州巡抚许容进呈3件奏折，一件奏折奉到防边固疆之上谕，折尾提到有关征剿准噶尔事宜“四条另折密奏”，同日的另一件恰是奏陈这四条管见的折子，为便于读者利用，二折理应排在一起，而《宫中档》第18辑却将该二折分开，中间插入了其它折件，《雍正朱批》第21册即对此做了相应的调整。

二是对同人同日奏报多项事宜的折件，分类编排。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具奏12件折子，《宫中档》第6辑将其收录，但排列的次序很没规律，同一类内容的折子相互隔离。《雍正朱批》第7册将这12件奏折分类，其中缉拿四川人贩折3件、滇黔官员操守折4件、地方文武送部引见折2件、其它方面的3件，如此按内容分门别类地集中，依次编排，使12件奏折井然有序地再现在读者面前。

三是同一事件，不同官员在同日或相接的两日内具呈的奏折，尽量编排在一起。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两日内，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和广东总督郝玉麟先后奏报查办潮州已革武举俞猊窝盗结盟一案情由，《宫中档》第19辑在这两件奏折之间插入了李卫、程元章二人二十二日的5件奏折和焦、郝二人4件其它内容的奏折，《雍正朱批》第21册作了较大调整，将二十二日郝玉麟折紧接二十一日焦祈年折，并把焦祈年所奏查处俞猊折放在焦折最后，郝玉麟奏报这一事项的折子放在郝折最前，从而使同一内容的两件奏折排在一起。

另外，《雍正朱批》对原折没有详确的日期的折子，亦作一定的考证予以编排。现存雍正朝朱批奏折，有不少未写明具折时间或时间不详，对这类奏折，鉴于编辑时间仓促，难以一一考证各折的具体时间，《雍正朱批》便酌情处理：有年月无日期的，分编于该月之后；有年代无月日的，分编于该年之后；年月日全无的，编于卷末。对后一种情况，即没有具折

时间的折子，《宫中档》的编排很随便，无甚讲究。《雍正朱批》则把这类奏折集中在第31—33册，按具折人的姓氏笔划为序，依次分人排列；对同一人的几件、几十件甚至百余件的无时间奏折，考辨出它们大致的具折时间，分先后顺序编排。

（2）《雍正朱批》中的标题目录比《宫中档》更精确些

《雍正朱批》各册之首均编有该册目录，对所辑奏折逐一摘由拟题，较为精确地反映了具折人和奏折内容。对《宫中档》原有的标题目录，因其中很大一部分未能准确地说明奏折的内容，有的比较笼统，有的不能恰当地概括折中的事由，甚至有错误的，对此，《雍正朱批》或将其修改，或重新拟制。《宫中档》第3辑载有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宜兆熊一折，其目录标题是“福州将军宜兆熊奏为密奏管见折”，《雍正朱批》第4册将该折标题改为“福州将军宜兆熊奏副都统总兵不宜准其密奏折”。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河道总督齐苏勒具折奏道：河南武陟龙王庙工程告成，其神象开光及业已钦赐之匾额悬挂日期，请勅钦天监选择吉日。《宫中档》第3辑错将该折标题拟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齐苏勒奏请钦赐龙王庙匾额折”。《雍正朱批》第4册即将此折标题改作“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河南武陟龙王庙工程告竣请钦赐吉日悬匾开光折”。

对于其具折官员的职衔，《宫中档》的标题中不少是照抄原折，比较繁琐，如“镇守广州等处将军管源忠”、“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黄叔琬”、“提督浙江等地方总兵官杨长春”等。对这些官衔，《雍正朱批》编制的标题力求简明些，分别改为“广州将军管源忠”、“广西布政使黄叔琬”、“浙江提督杨长春”。对一人兼有几个职衔的，《宫中档》的目录多是都开列出来，如“署理山西巡抚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兵部左侍郎副总河嵇曾筠”。《雍正朱批》的标题则改用实衔，用与所奏内容相关的职衔，象上面提到的即改为“山西巡抚伊都立”、“副总河嵇曾筠”。《宫中档》目录中的官员职衔，有的过于简单，如“永北总兵柳时昌”、“安龙总兵蔡成贵”等。对这类情况，《雍正朱批》在目录中冠以省名，写清“云南永北总兵柳时昌”、“贵州安龙总兵蔡成贵”，以便读者利用。

雍正朝汉文奏折有些只注明了奏折人的姓名，没有写明职衔。《宫中档》对这类折子，在拟题时也只注具折人姓名，对其官职没有考证标出。《雍正朱批》对这些奏折则分别考证，使原来没有具奏人职衔的奏折，标题内基本上都注明了官衔。如《宫中档》第8辑目录上没有标明职衔的阿克敦、葛森、魏廷珍、马尔泰等具奏官员，《雍正朱批》第10册的目录标题上分别标明了“广东巡抚阿克敦”、“江安粮道葛森”、“安徽巡抚魏廷珍”、“工部侍郎马尔泰”。

《雍正朱批》还纠正了《宫中档》目录中一些其它方面的错误。如《宫中档》第11辑目录，把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署山东巡抚岳濬奏查核酌议临清关则例税额事宜折，错写成“二十七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陈临清关征收税银事折”；把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九日陕西巡抚西琳奏谢恩赐月饼等物折，错写成“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谢恩赐月饼折”；把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巡抚朱纲奏谢恩赐磁器折，错写成“初八日”；是月二十日浙江湖州知府唐绍祖的一件折子，错写成“十九日”。对此，《雍正朱批》一一辨明更正。

（3）《雍正朱批》考证和调整了《宫中档》中不确当的附件

《雍正朱批》对《宫中档》中的汉文奏折及其附件，原则上仍照该书编排的正附件从属关系辑录，但经过考证，对附于有关各折之后而并非是该折附件的朱谕、条陈、清折等则均作调整。

考证调整的朱谕。如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河南巡抚石文焯的几件奏折内附有两条朱谕，一条谕石文焯等回奏火耗盈余，另一条命石文焯等密访白莲教。《宫中档》第 2辑将这两条朱谕一同作为石文焯奏复知县林赡熊等人官声折的附件，而在同天石文焯还有遵旨奏复火耗盈余用补亏空折和奉旨密访白莲教教徒折，《雍正朱批》第三册遂将两条朱谕分别改附在这两件奏折之后。

考证调整的条陈。如《宫中档》第2 辑，在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地方得雨情形折后，附有一件关于河南河工办料累民筑堤需夫的朱批条陈，这件条陈与该折本无关系。经考证发现，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石文焯有一件钦奉朱批条陈议复豫省河工事宜的折子，折中恰谈到这件条陈，理当作为该折附件，《雍正朱批》第 3 册在收录这份朱批条陈时便作了调整。

考证调整的清折。如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七日，直隶霸昌道高淳进呈折件两个，一件奏报驿递积弊，其折尾声明：所属州县卫额设马匹应减杂支项下银两数目“另具清折恭呈睿览”，另一件即是开报这笔银两数目的清折。显然，清折应附在后面。《宫中档》第12辑内却是该清折在前，《雍正朱批》第14册收录这两件时，即作调换。

类似情况不少，仅《雍正朱批》第 3 册，对转录自《宫中档》中的附件经过考证作了调整的就有13件。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有关附件，《雍正朱批》亦一一考证编排。

（4）《雍正朱批》纠正调整了《宫中档》中某些折件的拼版错误

拼版是影印出版档案史料的重要一环。由于奏折长短不一，有的仅几扣，有的长达十几扣，稍有不慎，便会出现同一奏折前后或几件奏折相互间拼排的错误。《宫中档》第 4 辑第293—294页载有福建台湾总兵林亮两件奏折，在拼版上出现了错误，其原书依次是：奏报台地生番归化折前半部分；奏谢御赐蟒缎折前半部分；奏报台地生番归化折后半部分；奏谢御赐蟒缎折后半部分。同是《宫中档》第 4 辑的第893—896页，有 3 件奏折的拼排相互交错，依次是：冯廷辅奏保送康世爵折开头部分；韩良辅奏保送张箕节马有凤折前半部分；冯廷辅奏保送康世爵折后半部分；韩良辅奏整顿安南边境折中间部分；韩良辅奏保送张箕节马有凤折尾部；韩良辅奏整顿安南边境折开头部分、尾部。这种情况在《宫中档》中有不少。《雍正朱批》编者在拼版上注意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作了认真的纠正，另一方面力求避免同类失误。

此外，《雍正朱批》还以《宫中档》中有的两折之间距离过近以致难以分辨，及书内各折没有顺序号给读者查阅带来不便等问题为借鉴，在拼版时注意保持折与折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各折依次编号。

诚然，《雍正朱批》在编辑和出版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考证工作没有彻底完成。尽管《雍正朱批》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做了许多考证和研究工作，但却有3100余件没有时间的折件未能一一考证出其确切时间，这些本应辨明时间分别编入相应的书册之中的折件被集中编在一起——虽然注意了编排顺序。《雍正朱批》遗留下的这些为数不小的考证工作，固然是由于编辑时间的紧迫而造成的，但也确成为该书的一大缺憾。二是影印质量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现在读者打开《雍正朱批》，有时会发现个别地方不够清晰，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原始折件字迹过细过轻或转录于《宫中档》之中的折件已较模糊，加上编辑出版过程中几次缩印翻拍，又受到机器设备性能质量的限制之所致。另外，各册目录由于是手抄后缩印，也有

虚笔不清之处。这些都给读者查阅带来了不便。三是，书脊、封面和扉页没有标明各该册所辑奏折的起止时间。《雍正朱批》收入的奏折跨雍正一朝13年，共分40册，为便于读者查阅，本当在各册书脊、封面和扉页的显要位置标清该册所收奏折的起止年月，遗憾的是该书没有做到这点。首批1—10册出版后，这个问题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并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即自11册之后，在各册的封套上印上该册起止时间，但这终非善策。此外，《雍正朱批》还存在一些其它方面的缺憾甚至硬伤。

大型档案史料汇编《雍正朱批》的编辑和出版，给了我们这样一点启示，即影印出版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公布历史档案的方法。它有着铅印排版难以比拟的优点，既可如实再现档案原貌而避免发抄排字过程中难免的失误，又可大大加快编辑出版的速度。当然，编辑影印的档案史料并非简易，它决不是把手中的档案予以简单的排列就可以了，《雍正朱批》的编辑工作表明，影印编辑也需做许许多多的档案考证和史实研究工作，而且还要研究和解决影印工作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上接第65页）

⑦《张文襄公全集》卷34，奏议34，《筹设商务局片》.

⑧《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3年2月，总3944页。

⑨《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3年2月，总3945页。

⑩《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4年4月，总4095页。

⑪《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4年8月，总4224页。

⑫三折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7年8月，总4727—4771页。

⑬⑭⑮⑯⑰㉓㉔㉕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637—647、678、582、583、513—538、499、474、484—485页。

⑱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38页。

⑲《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7—8页。

⑳根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870—919页厂矿统计表计算。

㉑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有关章节。

㉒《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